

治水新解

——对历史上若干治水案例的分析

陈阿江

(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8)

摘 要 治水小则影响人民的生产生活,大则影响社稷安危,所以治水不单纯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蕴含了复杂的社会科学问题。以“大禹治水”、都江堰水利工程、治黄故事、三门峡大坝等历史事件为案例,从治水中的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长远利益与近期利益、治水人的科学精神和敬业精神,特别是治水方法论等角度重新解读,认为早期的以解决“水量”问题为主要特征的治水经验与教训,对当下的以解决“水质”问题为核心的治水仍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 治水;大禹治水;都江堰;治黄;三门峡大坝

中图分类号:D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09)03-0001-05

治水贯穿于中国社会漫长的历史。历史上,中国人治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曾有过深刻的教训。概括地说,治水成败,小则影响农民的收成,影响老百姓日常生活乃至财产与生命安全,大则影响国家的稳定、社稷的安危,所以,治水既是无数民众的日常实践活动,是工程专家的研究对象,也是社会科学家的研究领域,还是统治者所关心的问题。很显然,治水不纯粹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涉及经济、政治、社会诸领域,蕴含了大量复杂的社会科学问题。

关于治水与中国社会的关系,魏特夫(Karl Wittfogel)的观点不能不提。魏特夫从非常宏观的角度解释了“治水”与中国政治制度之间的关系。魏特夫认为东方社会与治水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由于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和管理的需要,建立了遍及全国的组织,形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君主专制^[1]。关于魏特夫的论点多有争议^[2],另外关于中国古代特有的社会制度的形成也有不同的解释,笔者无意在此问题上多费笔墨,而只是想说魏特夫的论题确实开创了“治水”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研究先例。日本学者的中国水利史研究就是在魏特夫的议题上展开的。

与上述宏大研究的取向有所不同,国内一些学者近年来从社会史的角度,对水与社会的关系史给予特别的关注。赵世瑜以相对干旱的山西晋中、晋南地区的分水案例为基础,试图揭示乡土社会内部

的权力关系,以及为协调这一关系而逐步确立和完善的制衡性制度^[3]。钞晓鸿以关中中部的渠堰灌溉系统及水利共同体的演变为案例进行分析,试图揭示出环境演变、水资源属权、用水分配等与水利灌溉的关系,而其核心仍然在与灌溉相关的社会关系^[4]。钱杭以浙江萧山湘湖及其灌溉而致的社会关系即他所称的“库域型”社会为对象,分析水库最终淤塞废弃的主要原因,他认为本土居民因为固守原来的伦理规则,缺乏开放心态,未能处理好与后来的外来移民的关系,从而丧失了重建秩序的机会,加剧了湖体的淤塞,最终损害了相关人群共同的家园^[5]。上述的研究基本上以“水利共同体”这样一个理论视角展开的,所以行龙试图倡导新的研究视角,他以缺水的山西为例,认为除了魏特夫的“治水社会”和日本学界的“水利共同体”,还可借鉴学习法国人文地理学和法国年鉴学派^[6]。

笔者近年来主要从社会学角度、同时兼顾其他社会科学的视域,研究当前水污染问题的社会文化成因,以及对目前的水污染治理的效果进行反思。对当下社会研究的同时,也注意了解、收集和思考中国的治水史,思考长时段的人水关系及解决水问题的基本范式。笔者认为,宏观地长时段地看,治水或曰人类与水的关系,简单地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里,人类治水主要解决的是水的“量”的问题,试图解决自然的供给与人类需求之间的矛盾,

收稿日期:2009-06-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7BSH036);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04SHB017)

作者简介:陈阿江(1963—),男,江苏吴江人,教授,博士,从事环境社会学、城乡社会学等研究。

即洪涝与干旱的问题。那时候自然变化对人类的影响比较大,而人类的活动能力对自然界而言相对比较小,人类活动的负面影响比较小。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新能源的开发利用和经济水平的提高,人水关系进入了我所称之为的第二阶段。在此阶段里,人类支配自然之水的能力大大增强,基本上可以做到“水旱从人”,洪涝和干旱虽然时有发生,但比较人类活动对水体影响而言相对比较弱了,而包括污染等等在内的人类不当活动所造成的影响,即“人类自己制造的麻烦”却成了治水的核心。诸如水污染问题(包括严重的工业污染、农业生产污染、生活污染)、过度的围湖造田、森林草原退化等活动,都属于这个阶段产生的问题。

就社会科学层面而言,水污染问题的研究主要涉及经济、政治、社会与文化等层面的问题。比如,笔者在研究太湖流域、淮河流域的水污染问题时,首先是研究它们的水污染的社会文化方面的原因,进而研究目前水污染治理的政策、法规与机制。在对现有的水污染治理策略进行深入思考时,笔者发现,虽然在表面形态上前后两个阶段的治水有很大的差异,比如“大禹治水”,初看好像与今天的太湖的蓝藻问题的解决难以进行比较,但如果抛开物质的形态差异、技术阶段的差异,就方法论层面和深层的社会文化因素,解决“第二阶段”的水问题,仍然可以从“第一阶段”的案例中学习和借鉴有益的东西。笔者就是基于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与水情的基础上,对历史上有限的几个案例进行比照和分析,试图为当下的治水提供有益的启示。

大禹治水

大禹治水在国内是个流传非常广泛的故事^①。

帝尧时,中原地区洪水泛滥,水患成灾,百姓愁苦不堪。帝尧命鲧治水。鲧用在岸边设置河堤的办法治水,但水却越淹越高。历时九年未能平息洪水灾祸。鲧被治罪,处死在羽山。帝舜命鲧的儿子禹继任治水。禹总结、检讨鲧治水失败的教训,改革以“堵”为主治水方法为“导”为主的方法,利用水向低处流的自然趋势,疏通了九河。禹亲自率领老百姓风餐露宿,整天泡在泥水里疏通河道,把平地的积水导入江河,再引入海洋。治水期间,禹翻山越岭,淌河过川,测量地形、河川,规划水道。禹为了治水,费

尽脑筋,不怕劳苦。禹治水居外 13 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精神,增强了人民治水信心。经过了 18 年治理,消除中原洪水泛滥的灾祸,取得成功。禹整治黄河水患有功,受舜禅让继帝位,国号夏^②。

禹生活在距今约四千多年的多洪水而人类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又极其弱小的时代。今天,无论是黄河流域的地理环境,还是其经济状况、政治制度、社会条件都有很大的差别。但从今天的角度看大禹治水仍然有其意义的地方。

首先,大禹治水的方法论在今天仍然有其现实价值。由于时代变迁、技术进步,分析大禹时代的“纯”治水技术,已经没有意义,但比较大禹治水与其父亲鲧治水的得失,其中的方法论在今天仍然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禹的父亲鲧主要采用“堵”的办法。当洪水来临的时候,鲧主要采取筑坝堵水的方式。但是水太大,“堵”的技术也不够先进,所以大坝不足以抵抗洪水的威力,以至于前功尽弃,治水失败。禹吸取了其父鲧治水失败的教训,采用了与其父亲不同的办法,对洪水进行疏、导的办法,最后取得了成功。如果比照目前的某些水污染治理方案,就不难发现更多地从局部和眼前的“效果”入手,比如更喜欢用物理、化学的办法,而轻视相对困难的生态的办法进行治理,以至于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实际存在的问题。

其次,从组织管理、政治策略看,大禹的做法也值得肯定。禹成功地联合了其他部族的人群共同治水。黄河水泛滥,影响涉及很多地区的人群。水是一个系统,影响人群也是一个系统,因此治水的办法也必须系统地考虑。而禹的聪明之处在于他不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是联合了其他的部落,综合地、系统地处理问题。

再次,道德层面上的意义。中国是一个重道德和教化的社会。诸如小学生课文中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主要是宣传他的美德。但他的敬业精神仍然是许多人所缺乏的,而敬业精神正是解决一项艰巨任务所必须具备的。所以大禹的治水精神在今天仍然有现实的价值。

都江堰工程

如果大禹治水只是个传说故事,那么,都江堰工程本身留给了我们无比真实的构建物,通过这些有

① 大禹治水的故事,史学界一般认为基本属实,但存在争议。笔者认为可能存在两种“事实”。一个是历史传说和记载的真实。如果不是历史事实的话,作为建构的“事实”应当无可争议。而社会建构的“事实”——“疏”“导”比“围”“堵”有效,在今天仍然具有一般意义。

② 参见“大禹治水”词条,郑连第主编《中国水利百科全书·水利史分册》,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69~70 页,及维基百科词条“禹”<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A6%B9&variant=zh-cn>。关于“大禹治水”,古文獻《尚书》、《墨子》、《孟子》、《史记·夏本纪》等均有记载。

形物及其运行,可以清楚地了解到先人的治水和用水的思路与方法。

自战国末都江堰工程建成以后,经过历朝历代的维护与可持续运行,总结出“深淘滩,低筑堰”、“乘势利导因时制宜”等基本思路。就都江堰工程的宏观思路看,设计者无意去改变岷江的水系与水流的基本面,而仅仅是想“借用”岷江的一小部分水、顺流到下游平原,方便下游人民的灌溉和用水(这与今天我们看到的动不动就截断河流建坝建闸的思路很大的差别)。古人利用岷江出山口处这个特殊的地理条件与位置,修建渠首工程以分水^①作为一个受益面广、受益时间长达千年的工程,以下几个核心问题的解决对我们今天的治水仍有启发意义。

从向下流的岷江水获取一定的水量,分水导引到下游平原,使下游获得自流水,犹如建成一个免费的自来水系统一样,方便了农业生产和日常生活。实现分水而取利似乎并不难,但难的是,我们怎样才能仅要“利”,而不要“害”,而且是一个长久的“利”,而不是一时的利?

所以,设计者、建设者必须同时解决避害的问题。根据成都金沙考古资料以及相关的史料记载,在秦以前更早的年代里,洪涝灾害是成都平原频繁发生的灾害。在那个时期,洪水泛滥是经常发生的事,而人类控制洪水的能力却十分有限。因此,修建在岷江出山口处的这个分水工程,分出的水流不能太大,而且必须能得到有效地控制,否则取利不成反成了岷江水向成都平原宣泄的通道,大水年份风险更大。古代的工匠精英利用鱼嘴分水、飞沙堰二度分水以及宝瓶口束水制水,有效地解决了分水“取利”后的“避害”问题。

如何保持工程的永续利用更是一个难题。众所周知,三门峡大坝建成后不久,就因为泥沙问题而不得不进行改造。当年力主修建三门峡大坝的专家和官员,半个世纪以后,不得不面对现实而力主拆坝。而都江堰建于公元前256年,距今已二千二百多年,自修成以后,成都平原成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的天府之国。古人发明和总结了一套“治沙防堵”的技术,是都江堰永续利用的关键。

2000年11月,都江堰和青城山一起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人们一般认为,都江堰工程留给了世人一个用水方便、效益良好(包括今天的旅游收入)

的工程,而从全球生态危机这样的角度看,都江堰留给了我们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如何永续利用水资源的世界性遗产。从全球角度看,这样一个软遗产比硬件的意义更大。时至今日,也许工程专家很自豪,因为他们已经完全能控制岷江的水流了。但是问题也恰恰产生于此,人类已经完全降伏了岷江,但岷江水系原有的系统特征却遭到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农业方面,都江堰下游灌溉面积不断扩大,灌溉面积超过千万亩;工业与城市用水方面,随着成都市规模的扩张,工业用水、生活用水以及清洁城市用水(所谓的环境用水)不断增加;另外,上游兴建大量的梯级电站。所以,从长远的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当今岷江水系上的工程建设留给后人的,有成就也有遗憾和教训。2009年1月17日,笔者再访都江堰,发现都江堰岷江之外江已无水可流。当都江堰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时,我们恰恰忘记了世界遗产最本质的意义。

老残议治水

黄河在中国是一条特殊的河,清末在中国历史上是个特殊的年代。在刘鹗的小说《老残游记》里,有一个关于治黄的故事。当然,在此故事中,黄河水只是故事的载体,演员怎么演戏,“老残”自有安排。我们先来看看黄河水淹百姓的悲剧是如何发生的。

“……俺这黄河不是三年两头的倒口子吗?张抚台为这个事焦得了不得似的。听说有个什么大人,是南方有名的才子,他就拿一本什么书给抚台看,说这个河的毛病是太窄了,非放宽了不能安静,必得废了民埝,退守大堤。这话一出来,那些候补大人个个说好。抚台就说:这些堤里百姓怎么是好呢?须得给钱,叫他们搬开才好。谁知道这些总办候补道王八旦大人们说:可不能叫百姓知道。你想这堤埝中间五六里宽,六百里长,总有十几万人家,一被他们知道了,这几十万人守住民埝,那还废得掉吗?’……这年春天就赶紧修了大堤,在济阳县南岸又打了一道隔堤。这两样东西就是杀这几十万人的一把大刀!可怜我们这些小老百姓哪里知道呢!”^{[17] 141-142}

决堤后,老百姓的遭遇可想而知,而这恰恰是政绩工程制造的人间悲剧^②。为升官、为个人私利,而制造政绩,不同的时代会有不同的表现,但其基本的表达和机制是十分相似的。为个人或集团的私利作

① 都江堰工程历久不衰,既有自然条件的因素,也有人的因素。从自然方面看,岷江水资源十分丰富,都江堰渠首工程的地理位置十分优越。从工程和管理方面看,合理的工程布局、科学的引水防沙经验和严密的岁修制度是工程长期有效运行的重要保证。

② 在小说的前面部分,老残对一些“有才且想有作为”的官员有过议论。老残道:“我说无才的要做官很不要紧,正坏在有才的要做官,你想,这个玉太尊不是个有才的吗?只为过于要做官,且急于做大官,所以伤天害理的做到这样。而且政声又如此其好,怕不数年之间就要方面兼圻的吗。官愈大,害愈甚,守一府则一府伤,抚一省则一省残,宰天下则天下死!”(参见:刘鹗,《老残游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64。)

决策,而没有信息透明机制、监督机制,又没有其他的牵制力量,最终的结局无疑会非常糟糕。这一点,无论古今,性质是一样的。

从方法论上讲,治河中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是导致悲剧发生的最主要的方法论特征。西汉时期,黄河决口频繁,水患严重。贾让应哀帝召,提出治黄见解,后称贾让“治河三策”。贾让的上策是:开辟滞洪区,实行宽堤距,迁出滞洪区人口,人不与水争,河定民安;中策是:开渠建闸,发展引黄灌溉,并从漳河分洪;下策是:加固堤防,维持河道现状^[8]。后人对贾让治河三策的效果多有争议,这里我们不作评论。但小说中的书生用贾让的《治河策》来论证如何治理黄河,而完全忽视了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时代不同了、技术条件也改变了,但类似这样的问题、这样的人,今天并没有绝迹。一些技术专家,不顾中国的具体国情,把西方的技术和标准简单地移植过来,其结果难免不犯教条主义治水的错误。所以刘鹗借用老残的口说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话。

老残向人瑞道:“这事真正荒唐!是史观察不是,虽未可知,然创此议主人,却也不是坏心,并无一毫为己私见在内,只因但会读书,不谙世故,举手动足便是错。孟子所以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岂但河工为然?天下大事,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坏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7]48}

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之所以有生存的空间,是因为它有一定的社会心理与文化土壤。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之所以有市场,主要是因为它用一种简单的办法,依样画葫芦,简单模仿,十分方便,合乎“人性”偷懒、省事的特点。斯科特在揭露极端现代主义所存在的问题时,也反复提到了简单化的问题。国家为了能够掌控民众实施社会工程,必须进行清晰化和简单化处理。这样的清晰化和简单化虽然从表面上看易于实现预期的计划,而实际上却导致巨大的社会灾难^[9]。此外,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者常常以名人、名言为依据,容易说服受众使他们接受。照抄本本,可以不用动手去实验、实践,相对而言,独创的新东西反而不容易为人接受。

三门峡大坝

关于治水、治黄,三门峡工程留给了社会科学家颇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也给当代社会流下一笔丰厚的反思素材。因为三门峡工程本身非常复杂,不是这篇短文所能展开分析的,所以这里仅取三门峡决策争议过程中的焦点人物黄万里的相关事项作些分析。

当年在讨论是否上三门峡工程时,只有黄万里

反对。上三门峡工程的理由很“充分”。工程建成以后可以提供大量的电力,拦蓄泥沙可以减少对下游的影响,减少对黄河下游泛滥造成的经济损失,消除安全威胁。在当时的背景下,重大工程的实施本身具有非凡的政治意义。此外还一层隐含的政治意义是“黄河清、圣人出”^{[10]34}。治黄是历代政治家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在中国人的观念里,物理世界的变化会折射出政治时代的状况,而毛泽东是显然知道这一点的^[11]。黄万里认为黄河是不可能清的,黄河清就意味着灾难。黄万里反对建大坝,他的理由可以说是科学的,也可以说是常识。如果从水库流出去的全是清水,从上流冲下来的泥沙一定全部淤积于水库中。淤在水库中的泥沙必然会抬高渭河的出口,降低渭河泄洪能力,从而使渭河下游发生水灾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那么众多的技术专家是怎样解释和预备解决这个问题呢?专家说用水土保持的办法可以解决黄河的泥沙问题。假使黄河上游的泥沙减少以至不往下流了,这样对大坝就没有影响了。

在向苏联方面提出的《技术任务书》里,中方给出的关于水土保持减少泥沙的数据是:到1967年末,沙可减少50%,50年之后减少100%。就连对黄河泥沙不甚了然的苏联老大哥也惊讶了,分别把1967年末,沙减少量及50年后的减少量改为20%及50%^[12]。

1955年7月1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有关水土保持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

“……只要6年,在三门峡水库完成以后,就可以看到黄河下游的河水基本变清。我们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国人民,不要多久就可以在黄河下游看到几千年来人民所梦想的这一天——看到黄河清。”^[12]

事实证明,黄河三门峡以上段的水土保持到今天也没有解决好,以后也很难能按照人类的理想状况解决好。当时只有黄万里一人根本反对修筑三门峡大坝,没有一人同意黄的反对意见,只有温善章提出改修低坝。最后黄万里提出预留施工底孔,获得同意。但后来苏联专家坚持按原来的设计进行堵孔。按这样设计所修建的三门峡工程,很快验证了黄万里当初的预想。1958年11月,三门峡工程开始黄河截流。1960年9月,关闸蓄水拦沙,潼关以上渭河泥沙淤积,大量泥沙沉积在潼关到三门峡的河道里,渭河两岸的土地因为三门峡水库蓄水而盐碱化,富饶的关中平原农业减产减收。更为麻烦的是

泥沙淤积向上游延伸,严重威胁到工业重镇西安。随后不断地对才建成的大坝进行改造。

三门峡工程已过半个世纪,争论也成历史。今天似可以冷静地看待这曾经预想能够解决黄河水患的庞大工程,有几点在我们今天的治水现实中可能仍有参考价值。

如何看待外来学问和学者的关系。苏联专家的意见似有科学根据,但事实证明他们的设计不符合中国黄河的实际。黄河是一条非常特殊的河流,如果缺乏对它的真切的理解,治理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黄万里受过良好的教育,在美国多个大学得过学位,洋学问并不少。他能够独立地提出自己的见解,主要是他能够吸收各种知识却又不简单地套用某种教条。他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长期坚持从实践中获得真知,既不盲目追随权威,包括当时的苏联权威,也不盲目追随、不屈从于上级官员的意志。

这里也折射出在特定政治背景或社会环境下个人的选择与作为。在上级主意已定的情况下,力量单薄的个人确实很难改变大局,所以大部分人选择遵从。当然,有的人是真心认为某个决策是正确的,如果错,也只是一个认识问题。但也有的人实际上可能意识到问题的所在,但从政治上、从个人利益上考虑而选择遵从。所以,这里就面临着个人与大局利益的取舍问题。这样的情景在今天的工程项目中并非绝迹。

黄万里的家庭教育和独特的个人阅历使他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黄万里的父亲黄炎培,对他的教育很严,影响很深。黄炎培强调必须尊重农民,必须喷出热血地爱人!在四川道滩委员会工作期间,黄万里在峨眉县南的长江支流上设计、修建了一个简易水利工程。在黄万里接手之前的工程预算为40万银元,黄万里因陋就简以木板结构替代钢筋混凝土,造价仅4万银元。农民当年受益,可灌溉1000hm²农田。放水之日,农民欢声雷动,黄万里告诉农民,这是一个临时工程,可以用4年,先急救灌水打上粮食有饭吃,然后筹款筹料准备修建永久性工程。农民流着眼泪送别黄万里:“黄先生,你喝我们一杯水、吃我们一顿饭再走,行不行?”黄万里哭了,他想起父亲对中国农民的牵挂与评说,没有了他们哪会有五谷杂粮?哪还有华夏文明?^[12]

甚至在2001年8月8日黄万里弥留之际,他还不忘记治江治河之事。老先生向守候一旁的夫人要来

笔纸,写下他关于防治长江水患的遗嘱,叮嘱不要忘了“治江原是国家大事”^[10]。^[162]

黄万里的长女有一段评说自己父亲的文字。她说:

他和他那一代中国所有的知识精英一样,背负着民族危难的沉重的十字架。他们不会忘记战火中苦难的人民,也不会忘记洪水肆虐下苦难的人民。……他们从西方学到了先进的科学技术,更学到了科学、理性的精神。他们懂得,科学的真理是独立于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利益之外的,因此,他们绝不会因为权势或偏见而放弃科学的真理”^[10]。^[163]

总之,水的问题从表面上看是一个“物质”或“资源”的问题,但在治水的过程中,则更多地体现了“水社会”中人的行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因素对治水的影响。在期望快速解决当下的水污染问题的情势下,对历史上治水案例的反思,也许可以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决当下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卡尔·A·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 [2] 李祖德,陈启能.评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 [3] 赵世瑜.分水之争:公共资源与乡土社会的权力和象征[J].中国社会科学,2005(2):189-203.
- [4] 钞晓鸿.灌溉、环境与水利共同体:基于清代关中中部的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6(4):190-204.
- [5] 钱杭.共同体理论视野下的湘湖水利集团:兼论“库域型”水利社会[J].中国社会科学,2008(2):167-185.
- [6] 行龙.“水利社会史”探源:兼论以水为中心的山西社会[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33-38.
- [7] 刘鹗.老残游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 [8] 郑连第.中国水利百科全书·水利史分册[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4:70-71.
- [9] 姆斯·C·斯科特.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M].王晓毅,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 [10] 赵诚.长河孤旅:黄万里九十年人生沧桑[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
- [11] SHARPIRO J. Mao's war against nature-politic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revolutionary China[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49.
- [12] 党治国.科学的良心:纪念黄万里老师[DB/OL].[2003-11-06]. <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idWriter=0&Key=0&strItem=no01&idArticle=74417&flag=1>.